

[SUFE-IAR-200901]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2009 年度政策建议书之一

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短期增长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院

2009 年 7 月

目录

一、金融危机的背景及演变过程	1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2
三、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的原因	2
四、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6
五、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7
(一) 针对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7
(二) 针对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10
(1) 深化市场化改革, 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10
(2) 有步骤产业升级,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10
(3) 加快城镇化进程, 努力扩大国内投资消费需求	11
六、结论	12
本报告撰写人简介	13
附录 1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简介	13

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短期增长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院

近两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深化，已经演变成自 1929 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为此，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去年 9 月以来，我国政府也大幅调整了宏观政策取向，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宽松，并决定安排 4 亿元资金，通过十项措施来进一步扩大内需，年初又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从一些先行数据来看，中国和世界经济已开始出现企稳回升的迹象（当然不是所有数据都向好，一些数据还有背离）。但是，如果不搞清楚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本质，不搞清楚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的内在原因，不搞清楚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所在，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很可能又会为下一次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

一、金融危机的背景及演变过程

美国次贷市场泡沫的破灭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源头。2000 年美国 IT 泡沫破灭再加上次年遭受“9.11”恐怖袭击，使得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 13 次降息，2003 年 6 月 25 日更是降到 45 年以来最低点的 1%，并维持了大约 1 年之久。

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就是房贷利率的同期下降，过剩的流动性导致放贷机构瞄向那些信用记录较差、违约风险较大的购房人。放贷机构再把次贷打包卖给住房抵押贷款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则又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法将次债资产卖给华尔街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华尔街进而将其衍生生成各种金融产品，以证券、债券的形式出售给各类投资者，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在房地产不断升值的诱惑下，购买持有次级债券的各类银行、基金投资机构，为了眼前的报表业绩，也乐于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并且投行高管的收入跟财务报表业绩挂钩，而不承担什么风险。可以说，正是美联储的超低利率刺激经济的政策带动了新世纪以来美国次贷市场的泡沫泛起。

作者感谢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同事陈旭东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研究助理工作。

然而，随着经济的过热，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联邦基准利率由1.25%调高到5.25%，这使得美国连年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开始受到力度逐渐强烈的挤压，房地产价格开始持续下跌。一旦房地产市场升值的前提不复存在，次级按揭贷款违约率就开始急剧上升，次贷资产及其衍生产品的价值大幅缩水，从而导致持有次级债券的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流动性几乎一夜之间由高度过剩变成极度不足，导致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和升级。美国的许多重量级金融机构纷纷陷入破产或者被收购的困境，世界金融业版图也随之出现大幅震荡调整。

金融的基础是信心，信心一旦崩盘将造成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恐慌，加速实体经济滑向萧条的轨道。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今年世界经济将负增长2.9%。其中，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2%，远低于去年的5.9%和2007年的8.1%。报告预计，如果不包括中国和印度，今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下降1.6%，失业和贫困人口将进一步增加。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结论是有许多先决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没有经济的外部性。某个行业一旦存在经济的外部性，市场就会失灵，政府就必须对其进行适当规制，而不是放任不管。金融市场就是这样的行业，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传递性），一旦出问题就会危及整个经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盲目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纠错能力，过分强调市场自由和金融创新，而忽视了金融市场失灵，政府监管严重不足，促使华尔街精英在逐利天性下进行了大量的金融衍生操作，而忽视了自我风险控制。

金融系统的外部负效用性和传递性要求政府必须进行有效监管。然而，早在198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里根就开始了过度自由化改革，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对金融行业所制定的一些规则解除。以前主席格林斯潘领衔的绝大多数美联储官员，忽视了市场失灵的地方，过分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放贷机构的自我风险控制能力。这样，美国在新世纪之初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的交互作用下，让大批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拥有了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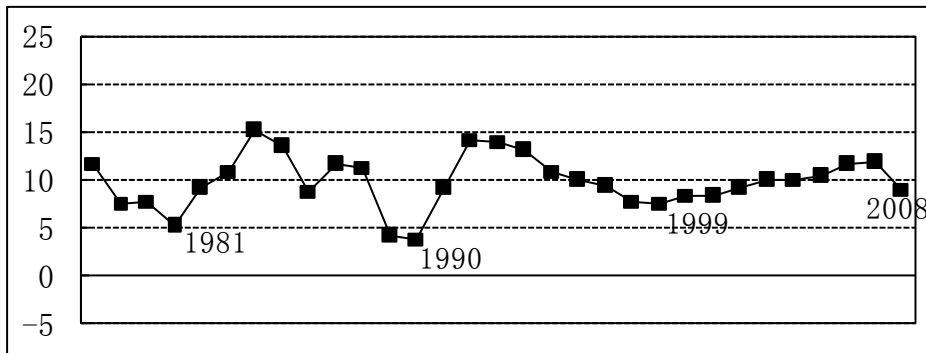
三、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从去年下半年突然出现大幅下调，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

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周期自身正好即将面临一个下行的拐点。从图 1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呈现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 1981 年到 1990 年；第二个周期是从 1990 年到 1999 年；第三个周期是从 1999 年到 2009 年。^①这三轮周期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同，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去年以来的经济大幅下滑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周期性回落因素发挥了作用。如果仔细分析各周期内的波动情况，可以发现前两个周期从波峰回落到波谷的时间分别用了 6 年和 7 年，年平均 GDP 增幅下降都在 2 个百分点以内，但是第三个周期经济增长率回落之快，幅度之大，与前两次有很大区别。

图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波动示意图



二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负面冲击。这使得外部需求突然收缩，加速了经济的下滑。2008 年 7 月，中国出口贸易的同比增长率即开始下滑，11 月份突然从上月 19.2% 的增长跌落为 -2.2%，到今年 6 月份这个增长率一直是负数，并曾达到 -26.5% 的历史新低。这是近 10 年来都没有的事情。需要指出的是，外贸出口之所以在短期内出现如此之大的降幅，这其中与人民币过快升值和新劳动合同法不合时宜的出台也有关联。

表 年 月以来中国月度出口情况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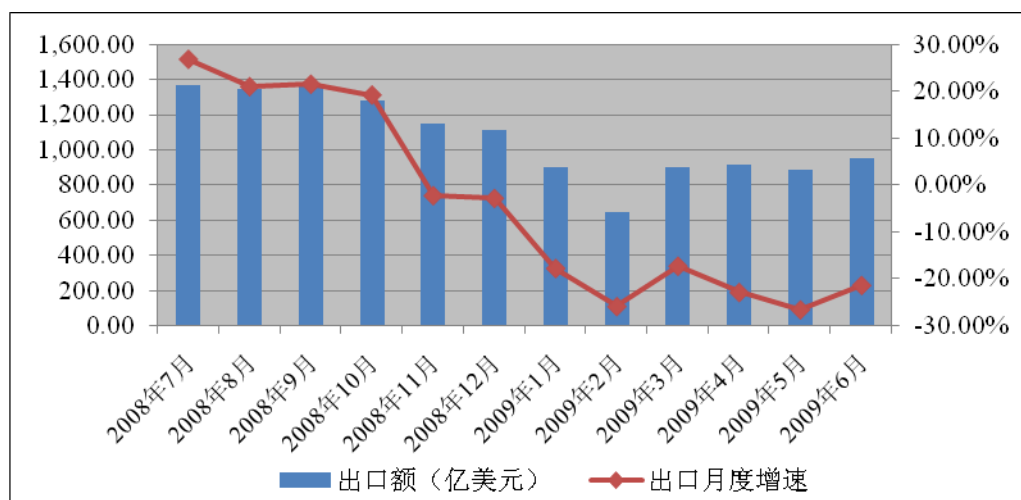
月度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当月出口		
		金额	上年同期	同比%
2008 年	7 月	1, 366.0	1, 077.1	26.8
	8 月	1, 348.2	1, 113.9	21.0
	9 月	1, 364.1	1, 122.9	21.5
	10 月	1, 283.3	1, 076.9	19.2
	11 月	1,149.9	1, 175.2	-2.2

① 参见许宪春（2009）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09）》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的讨论。

	12月	1, 111.6	1, 143.3	-2.8
2009年	1月	903.7	1, 095.8	-17.7
	2月	648.7	873.2	-25.8
	3月	902.2	1, 089.3	-17.2
	4月	919.3	1, 187.6	-22.8
	5月	887.4	1, 205.7	-26.5
	6月	955.1	1, 211.7	-21.3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图 年 月以来中国出口月度增速一览表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更进一步地加深了经济的下滑。治理经济的政策本来应该近似于中医治疗手段, 除非特殊情况, 一般应采用温和稳健的综合治理手段。但我国近一年的宏观政策手段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急躁性。2008年, 上半年宏观调控政策简直像是大泻药, 如央行曾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7.5%的历史高点。当时的政策基调重在应对通货膨胀的风险, 而忽视了经济可能出现的大幅下滑风险。根据货币政策一般有6个月至12个月时滞的特征, 宏观紧缩政策在下半年开始发挥作用。而这时刚好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发酵, 对中国经济形成了强大的负面冲击。于是, 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9月以后, 宏观调控政策又开始180度大转弯, 就像是用了一剂大补药。政策缺乏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大起大落, 这就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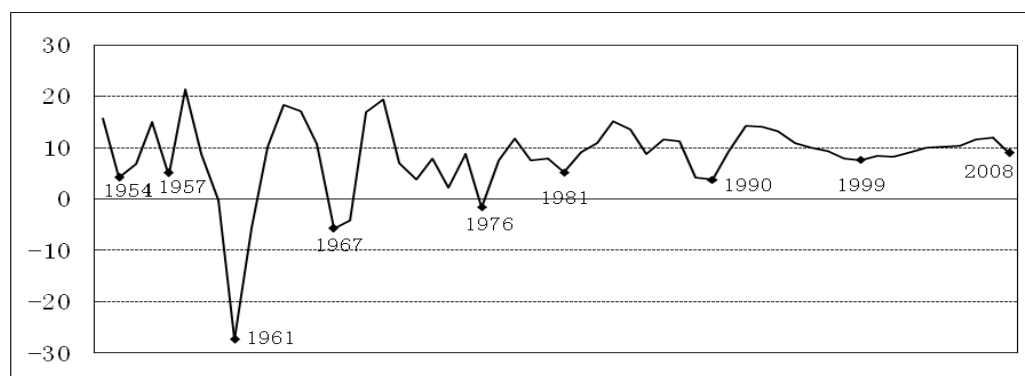
事实上, 早在去年上半年就已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比如笔者在去年6月份的一篇题为《治理通货膨胀, 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关于解决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膨胀两难的政策建议》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分析当时国内外经济状态及其成因后就指出, 经济大幅下滑和通货膨胀的风险是不对称的, 政府政策的重心应该是主要防止经济大幅下滑, 兼顾抑制通货膨胀, 采用

更稳健的基于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为此，在报告中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18字的综合治理方针。我国政府去年底出台的一些经济刺激方案和政策转向，基本与该综合治理方针的方向和内容吻合。

在上述三方面原因中，前两方面一个是经济周期的内在规律，另外一个外部的因素，都是不可控的。但这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预测的，对其风险和后果可以由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性作大致判断，由此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经济学不能拿社会做实验，更需要依靠其内在逻辑性。现实中政策最需要的是前瞻性，不是说问题出现了才解决，而应该有一个事先的预警机制。因而，需要充分了解内外经济环境，问题成因，从而根据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对经济走势作出科学判断。从中长期来讲，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发展的指导，也许比普通的数据统计、分析和预测更加有用，更加准确。第三方面则是主观的、内部的因素，是可控的，应该具有稳定性。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思想，正确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求我们在发展中求稳定，在稳定中图发展。稳定不只是国家、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还包括政策的稳定。当然政策稳定应该建立在前瞻性基础之上。

从历史经验看，政府行为对于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巨大，并且往往加大了它的振荡幅度，人为拉大了高峰和低谷。从图3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增长上曾出现过八次大的波动，跌入谷底，分别是1954年（4.2%）、1957年（5.1%）、1961年（-27.3%）、1967年（-5.7%）、1976年（-1.6%）、1981年（5.2%）、1990年（3.8%）和1999年（7.6%）。

图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波动示意图



从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经济表现看，2009年也许又是一次谷底，明后年中国经济很可能早于世界经济复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9次经济波动中只有两次完全是由不可控因素所致：1954年的天灾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另外7次的经济低迷则或多或少与政治或者政策不稳定有关，1957年的“反右”运动，

“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1975年“割资本主义尾巴”，1981年是首次对国民经济进行较大规模的宏观调整和紧缩措施，“89”政治风波后的1990年，以及这次“大泻大补”的宏观调控。并且，政治或政策越不稳定，下降越快、幅度越大（如1957年、1967年、1976年、1990年）。政府行为对于经济活动的干涉，尤其是一个缺乏具有前瞻性和稳定性的政策取向，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破坏性同样不容小视。如果政策不稳，会严重地影响经济活动，特别是打击人民对政策的信心，造成经济上大幅波动。

四、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尽管美国金融危机与大量衍生产品的推出不无关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禁锢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创新。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市场化程度不足，政府过度干预金融市场，阻碍了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系统的效率。只有合理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才能兼顾整个金融系统的效率性和安全性，使得中国经济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

从此次金融危机，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经济学基本理论训练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适用范围，即边界（先决）条件的，许多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在应用经济理论时往往忘记了这些先决条件。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即忽视了金融行业的巨大外部性（传递性），放松金融监管，导致机会主义者疯狂逐利，而使市场泡沫不断膨胀。

2、做预测时不能太看重经济数据。经济数据在许多情况下对短期预测和检验理论当然有用，但在有些方面如预测经济景气的时候，可能有它的局限性。其原因，就是用经济数据来预测经济景气时往往存在滞后性，往往需要3-6个月才能反映出来，并且数据只是已发生事件的量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数据去年上半年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好，如果完全依靠这些数据，就会得出中国的经济仍然在过热，需要抑制通货膨胀这一有问题的结论。结果到下半年，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政策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完全没有得到体现。

3、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前瞻性。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坚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不能大起大落，但是稳定性必须是建立在前瞻性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怎样才能具有前瞻性呢？靠什么来让我们得出事前的结论呢？这就是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也就

说，只要将经济现实环境，问题成因充分地把握住，就可以通过经济理论得出逻辑自洽的合理结论。

五、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格局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一方面可以乘机机会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自身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危机倒逼自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过去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失衡局面，转到主要依靠内部需求的道路上来。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防止短期经济下滑，恢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需要调整结构，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应该采用基于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对策，都需要增加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定性，在稳定中图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

（一）针对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为了在短期内恢复经济较快增长，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我们在此提出“增信心、稳两市、拉两头、优中间、扩内需、激出口”新的 18 字综合治理方针，来推动中国经济恢复到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以应对庞大的就业压力。

第一、增信心。信心是经济繁荣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解决当前最大问题的办法，首先就是要增加老百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而这要靠政策的稳定、社会的稳定。从这一点上讲，去年底以来中央政府推出的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及地方政府配套 20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其积极意义。

然而，我们也要充分注意政府的一些短期刺激经济的做法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比如中央、地方政府的 24 万亿投资计划，基本上是政府行为拉动，庞大的民间投资并没有被激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死灰复燃，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又重新获批开工；银行信贷投放急剧增加，今年上半年货币信贷快速增长，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7.37 万亿元，同比多增 4.92 万亿元，这一规模已超过此前央行“5 万亿元以上”的全年信贷增长目标。银行信贷的过度投放将大大增加潜在通货膨胀风险。并且，由于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对于经济形势的观望态度，使得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还是低迷不振。从表 2 可以看出，自 2008 年 7 月达到最高点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基本上一直是下行的，近期依然在 86 左右徘徊。增信心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日期	消费者 预期指数	消费者 满意指数	消费者 信心指数
2008.04	96.6	90.1	94.0
2008.05	97.0	90.2	94.3
2008.06	96.5	90.6	94.1
2008.07	96.9	90.8	94.5
2008.08	96.0	90.2	93.7
2008.09	95.6	90.0	93.4
2008.10	94.2	89.8	92.4
2008.11	90.8	89.2	90.2
2008.12	87.6	86.8	87.3
2009.01	86.9	86.6	86.8
2009.02	86.7	86.3	86.5
2009.03	85.9	86.1	86.0
2009.04	86.5	85.6	86.1
2009.05	87.1	86.1	86.7
2009.06	86.9	86.0	86.5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二、稳两市。即稳定股市和楼市，不要大起大落，这对于恢复信心、刺激消费、促进投资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需要保持稳定。如果股市不稳，大幅度下滑，会大幅减少家庭资产，加上居民的现期收入上不去，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的教育)等消费预期不断增加，现期的消费就会受到挤压，内需不足的情况会不断恶化。房地产行业则是中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并且直接关乎建材、基建、家居、服务等多个上下游行业的景气，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说，仍然是扩大内需的头号主力。因此，稳定和提振股市、楼市依然是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途径。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由于上半年 7 万多亿新增贷款中的部分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使得当前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些虚热迹象，值得警惕。因为虚幻财富效应的增加，可能会再度吸引各方资金包括信贷资金大举进入，进一步吹大资产泡沫，推高金融风险。并且，也可能抽干实体经济投资所需资金。因此，政府必须对激增的信贷资金进行适度引导，避免产生虚拟资产泡沫。

第三、拉两头。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稳定农业即等于稳定民心。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稳定农产品价格，使粮食供给保持稳定增长，建立让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强 8 亿农民的消费能力，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这对于确保粮食安全也是重要的一环。其次，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从 2003 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就一直停滞在 40% 左右，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70% 以上的比例，这一块还

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相对而言，服务业对能源、资源等要素的消耗较低，并且对于有效增加就业、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

第四、优中间。经济危机的一个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二产业而言，一方面我们要出台政策鼓励工业部门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水平，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高能耗、高污染为基础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的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实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我们要改变垄断行业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扩大民营资本市场准入，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让其进入原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促进市场竞争，让生产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益和效率。

第五、扩内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出口依赖型经济。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必须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调整。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打压非常明显，正好给经济结构的内向调整提供了一次比较难得的外部机遇。近期中央接连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扩大内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政府的短期经济刺激，经济增长难以维持很长时间，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关键在于盘活民间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直接而持久。

纵观当前各地的投资数据，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政府投资主导，民间投资不振。分析其中原因，民营企业的观望情绪和政府设置的进入壁垒等主客观因素，共同阻碍着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进入。这迫切需要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给民营资本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待遇，让它们良性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大对于研发和教育的投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以提高投资的长期经济和社会效益。

针对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扩大消费的路径有四：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提高国内居民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二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失业、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体系，提振消费信心，撬动居民储蓄；三是积极培育若干消费热点，比如住房、旅游、文化等等；四是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实行必要的减税、补贴和贷款优惠政策。

第六、激出口。尽管去年以来出口增幅下降很快，但是外需这一块依然不能忽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出口退税率已经被7次调高，这对于缓解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现金流吃紧局面，保持成本优势，维持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非常重要。我们要继续运用财政、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克服贸易壁垒，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欧美市

场以外的其他市场。

与此同时，一方面我们要顶住国际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停止人民币升值，这将缓解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的上升，帮助出口依赖型企业稳住一定的外部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要清理和取消不适应形势变化的限制出口的政策规章，避免困难时期增加企业的成本。比如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就不是很合时宜，而且其本身也不能体现激励相容原则。政府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当下面临着的庞大就业压力的现实国情，以及经济大幅下滑的实际情况，实行分阶段、分层次、分行业的逐步产业升级，而不是急剧的腾笼换鸟式的政策取向。

（二）针对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上只是一些关于短期内如何走出困境的应急措施。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应该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大量培养各方面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深化市场化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是由法治完善程度决定的，最终会体现到经济的绩效差异和社会的和谐与否上来。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一样，都是机会主义者。只有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用法治来约束政府也同时约束经济人行为，才有可能避免使中国滑入“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的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因此，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极其重要，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必须围绕此点进行。

那么，怎样转变及如何创新？那就是，只要市场能做好的就应该让市场去做，政府没有必要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需要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合同及各种法规得到严格执行）；市场不能做的，或者说从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因素考虑，市场不适合做的时候政府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也就是，在考虑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的和谐发展的时候，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市场和政府各自界定的边界来考虑。比如说，至少在竞争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退出，即使政府不退出也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才发挥作用，单独或者是与市场一起去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2、有步骤产业升级，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低端科技产业将逐步失去成本优势，因而我们需要促进这些产业内的企业放弃过去靠低成本扩张的策略，努

力提高管理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积累和产品研发，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升级应该是有步骤的，既不能够完全停下来，也不能够是一刀切的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逐步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把资本和技术更高效的结合起来，熟练掌握科学技术和运用复杂机器设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是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的人才保障。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人才培养是贯彻和实现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关键，必须具有前瞻性。虽然通过短期增加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来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只能依靠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来推动，而这一切都是创新活动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不能再简单地通过“引进+模仿”的知识进步模式来支撑持久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改革，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而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杰出创新型人才是实现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大学现阶段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总体上看，当今中国大学培养模式还远远不能满足培养大批杰出人才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与我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才需求存在着严重的脱节。那么，如何在中国的国土上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厚德博学的学术大师？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对中国大学办学理念 and 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如何才能培养厚德博学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中，笔者专门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3、加快城镇化进程，努力扩大国内投资消费需求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但中国城乡收入差别仍然过大，贫富差距的问题没有得到改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改革一度使得城乡差距大幅度缩小，但现在又扩大到改革开放之初。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会造成社会不稳及难以扩大内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种方法就是保持现有的做法，农村的土地不能减少，采取新农村运动，给予农村更大的支持力度，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不是综合治理的一般均衡方法。农村生产责任制尽管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包括用科技、农药、机械来提高农村生产力，但从整个农业来说，还有很大的不足，没有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找不出农民占大多数的例子。新农村建设固然重要，但

是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要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差距，农村人口城镇化是必然趋势，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因而，农民要有移动的自由，政策方面没有歧视，其关键还是要思想解放。城镇化也有好的城镇化和坏的城镇化，好的城镇化就是应该减少那些约束农民迁徙的自由和就业的自由，农民工子女能够像城市居民子女一样享受到同等教育，享受到同样的基本国民待遇。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途径。第一，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农业富余劳动力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向工业劳动力人口转移，意味着现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农村人口的减少使土地相对集中，农业的规模经济就可以发挥出来，农民在土地上的收入就可以增加，而农民转变成城镇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后也会带来收入的提高；第三，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能撬动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最需要最迫切的就是加快中心城镇建设，要规划建设一批地域布局合理、人口规模较大、基础设施完善的中心城镇，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群，解决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载体。

六、结论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经济学根源在于忽视了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有其边界条件，不能盲目运用。这次金融危机的启示有三：经济学基础理论训练非常重要、做预测时不能太看重经济数据、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前瞻性。

关于中国经济此次之所以出现大幅下滑，笔者认为自身经济周期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一些经济政策不当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前两方面一个是内在规律，一个是外部因素，都是不可控的，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提前预测到，但政策大起大落，欠缺前瞻性和稳定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应该采用基于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应该是一种平稳的调理，而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调整。也就是说，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对策，都需要增加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定性，在稳定中图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本报告旨在探讨这次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和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的原因所在。一旦将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找准了，运用经济理论制定应对措施就相对容易多了。为此，笔者在文中给出了“增信心、稳两市、拉两头、优中间、

扩内需、激出口”的新 18 字综合治理措施，但这只是过渡性的政策建议，重在“治标”，“治本”还要靠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报告撰写人简介：

田国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1987 年）。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首批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及评审专家，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美国德州 A&M 大学经济学教授（终身教职）。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现任国际英文学术期刊《经济与金融年报》和《中国经济评论》共同主编、中文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的编委。在国际英文知名学术刊物上发文近百篇，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文四十余篇，包括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文 9 篇。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理论、经济机制设计、幸福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经济等。

附录 1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简介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于 2006 年 7 月，为校直属的处级科研实体机构，是一个高起点、多层次、全方位的体制内的综合性学术和政策研究机构。高等研究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现任院长为海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德州 A&M 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田国强博士。

作为国家“985”工程优势创新平台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研究院的宗旨在于以准确的数据为依据，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手段，理论结合实际，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举，凝聚海内外的研究力量，以项目的形式凝聚海内外研究力量，发挥群体作战的规模优势，联合攻关，来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当前难点、热点问题，力图打造成为集政府决策咨询、重大项目研究、学术前沿探讨和高级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大型权威综合研究机构。

近些年来，高等研究院依托“经济学创新平台”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等欧美名校引进了 34 名优秀海归博士，同时整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统计与管理学院等学院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力量，形成了一支高层次的创新团队。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化研究平台。一旦将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和现状搞清楚之后，研究院就面向全世界的学者公开招标，综合国内学者对于问题现状的认知和国际学者对于微观实证的把握两个比较优势，形成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真正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

目前，高等研究院下设数据调研中心、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全球教育研究中心、环境与自然资源研究中心、卫生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效应评估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管制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心以及商业咨询中心等多个常规研究中心，分别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问题和当前热点问题进行攻关。